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ports
Foreign Relations (1949-2008)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史 (1949-2008)

罗时铭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江苏省重点序列学科（体育学）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0BTY044）资助出版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史

(1949—2008)

罗时铭 著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力 歌
责任编辑 张 力
审稿编辑 李 飞
责任校对 罗乔欣
版式设计 博文宏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史/罗时铭著. -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644 - 2188 - 5

I. ①当… II. ①罗… III. ①体育运动史 - 中国 - 现代
IV. ①G812.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2097 号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史

罗时铭 著

出 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海淀区信息路 48 号
邮 编 100084
邮 购 部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010 - 62989432
发 行 部 010 - 62989320
网 址 <http://cbs.bsue.edu.cn>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成品尺寸 240 × 170 毫米
印 张 28.5
字 数 452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2.00 元

(本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体育对外关系是国家对外关系的一部分。研究当代中国的体育对外关系，既是研究新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新中国体育事业整体推进与发展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育对外关系的处理，既是扩大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影响的重要渠道，也是表现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象征。因此，研究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对于更好地开创我国体育对外关系工作新局面，不断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关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研究虽然已有一些成果，但与新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取得的重大成就相比，无论在研究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够。因为，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向苏联、东欧学习，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引进外援”；无论是195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一波三折，还是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无论是1958年的中国退出国际奥委会，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和“奥运模式”；无论是对新兴力量运动会召开的支持，还是坚持对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体育援助。等等这一切，都有着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我们去厘清，有太多的历史人物需要我们去评价，有太多的时代背景需要我们去分析，有太多的成功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因此，在如今更大范围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在体育对外关系中加强和推动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体育多边交流，以形成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共生、和谐发展的良好格局，显然应是我们面对的重要研究课题。

本著述中的“当代中国”，时间上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空间上是指一个由23个省、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及5个民族自治区组成的共和国，也是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体育对外关系”一词，与通常所说的“体育外交”应略有不同。外交更多的是从主体角度出发对外施加作用、寻求效果，而对外关系则是在从主体角度出发对外施加作用、寻求效果的同时，还受到其它客体的反作用。所以体育对外关系既包括中国体育在国家对外政策背景下的具体工作，也包括国际体育组织、国际体育赛事，以及国家间双边和多边关系对中国体育发展的相关

影响和作用。

一、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发展阶段与特征

就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发展而言，本著述拟将其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段落：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在改革开放前（1949—1976）的这段时间中，有两个大的时间段，又有三个时间段。

其中1949—1956年为第一时间段。这是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其主要特点是在“一边倒”外交路线下，采取了全面学习苏联体育和向苏联体育看齐的做法。我们通过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在走出去与请进来的过程中，很快改变了我国以往体育的落后面貌，并逐步建立起新中国的体育新体制。如组织领导体制上，1952年11月我们参照苏联模式，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可以说，对苏联国家发展体育事业模式的模仿或照搬，是这一时期体育对外关系的重要成果，并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

1956—1966年为第二时间段。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1957年以后的激烈动荡，即各种力量经过分化与改组，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美、苏两国在保持两极格局的同时，形成了对中国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二是蓬勃发展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高潮。为此，中国在体育对外关系上开始将自己的战略重点从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联盟，而逐渐向亚非拉地区拓展，特别是主要发展与亚洲国家的体育关系，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其重要成果表现为：1958年我们退出国际奥委会以后，依然于1961年4月，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63年11月，我们又参加了印尼召开的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1966—1976年为第三时间段。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其特点是在联美反苏、推行“一条线”战略方针下，通过“乒乓外交”，让“小球转动了地球”；同时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方针下，中国大力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交往，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体育援助，从而影响了整个国际社会。其重要成果是：国际奥委会特向中国颁发“奥林匹克杯”，以褒奖中国政府对发展非洲国家体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非洲国家的体育外交开拓，是具有伟大时代战略眼光的重大成果。

总之，改革开放前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总体特征是：以“求生存”为

目标定位，千方百计去占领我们应有的国际体育舞台。在国别交往的双边活动中，我们更多的是以体育文化输入为主，以对外学习为主，从而逐步建立起新中国的体育制度，并在着力发展新中国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基础上，注意不断提高新中国的体育竞技运动水平。在与国际体育组织关系上，虽然远离了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但是中国体育并没有完全被孤立。

在改革开放后（1977—2008）的这段时间中，即1977—1992，1993—2008。其中1977—1992又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1977—1984年。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由拨乱反正到确定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体育对外关系也成功实现了新的历史转型。其对外体育关系的重要成果是不仅在“奥运模式”下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而且参加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并实现了中国体育史上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国别关系上，则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体育援助时期。其特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主导着中国体育的对外援助，并具体表现在：硬件上，是体育场馆的援建；软件上，是体育专家的外派。有资料表明，仅1977—1981年，我国政府就派出体育专家（主要是教练）225人，涉及乒乓球、排球、足球、篮球、羽毛球、体操、跳水、举重、武术等诸多项目。使中国在第三世界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另一块是1985—1992年。这是中国由确定经济体制改革到坚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背景下而发生的体育对外关系。由此我们在与国际体育组织关系的处理上，表现为全面争取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并以何振梁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89），徐寅生当选国际乒联副主席（1991）和吕圣荣当选国际羽联主席（1992）为标志。在国别交流上则开始出现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双轨制”形式。一方面在主体上，我国继续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体育对外援助政策，如中国政府体育专家的外派，到1991年时共向世界104个国家和地区派出教练员1309人次。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热”的带动下，我国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凭借着他们优异的运动成绩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获得了直接去海外或学习或工作的机会，从而形成了“海外军团”这一体育界特殊的文化现象。“海外军团”形成了一股新的对外援助力量，它对于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丰硕成果，对于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无疑担当起了“民间大使”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第二个大的时间段是1993—2008年。这是在我国不断坚持和深入发展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的体育对外关系。其重要成果表现在：与国际体育组织关系上，主要是加强相互间的全面合作和承担大国发展体育

的应有责任，以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并以北京的两次申奥为主要标志。在国别关系上，则是进入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多元时期，即出现了对外体育交流的多元化现象。如在体育越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体育对外援助出现了由过去的单向流动，即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有计划地向外派遣体育专家，或民间的自发出国留学，向后来的双向流动发展，即政府或民间可根据某些体育项目发展的需要，适当地“引进外援”。同时，随着国家体育体制的改革和中央机构的权力下放，地方和单项体育协会发展体育的自主权加大，他们也能更直接地和国外体育组织或俱乐部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或协作关系。再就是随着 1993 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对待出国运动员的管理方面，开始结合国际潮流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政策措施，实现了对外人员流动上由“卡”向“放”的转变，出现了多渠道、多方法、多形式培养和使用体育人才的局面。例如既有像世界速滑冠军和花样滑冠军叶乔波和陈露那样的，有组织有目的地定期外派到国外接受训练的模式；也有像世界女子铅球冠军黄志红、NBA 球星姚明那样的，允许运动员长期在国外学习、训练，但大凡有重大国际赛事，则要代表中国参赛。由此引发的结果是：不仅带来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全面繁荣，而且也增加了世界范围内的体育对话与交流机会，使体育的全球化 and 多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总之，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总体特征是：以“求发展”为目标定位，强调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如何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大国形象和担负大国发展体育的责任。在国别体育关系中，开始变以往的单向交流为双向和多向交流；变以往的输入为主，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输出（对外体育援助）、输入（引进外援）并举。在与国际体育组织关系中，则出现了全面合作，以求双赢的良好局面。从而使新中国体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并在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体育大国的同时，开始了向世界体育强国的转型。

二、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了一条历史主线。这条主线就是无论在任何时期，中国的体育对外关系都必须“坚持为国家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服务”。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个从单向交流到双向交流、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这条历史主线始终没变。同时，在发展主线不变的条件下，不同历史时期又有着中国体

育对外关系不同的策略特点。

如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更多的是发生在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那种“同志加兄弟”的交流。60 年代，在中国外交战略重心由“联苏反美”转为“既反美又反苏”的情形下，体育对外关系主要体现了不怕打压和努力拓展亚洲、非洲国际体育生存空间的重要特点。70 年代，中国外交进入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方针时期，由此体育对外关系主要是通过“小球转动地球”，逐步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中国体育从此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90 年代，随着香港回归和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中国表现，中国的外交影响力更是空前提高。与此相应，中国体育对外关系也实现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例如以熊猫盼盼为形象大使，北京成功举办了第 11 届亚运会。接着是北京的两度申奥，并最终于 2008 年成功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真正实现了地球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了战略重心的与时俱进。考察当代中国的体育对外关系，我们发现，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战略重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基本特点。可归纳为由初期的政治战略重心，向后来的经济战略重心迁移，再向文化战略重心迁移。而这种迁移的趋势，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所谓政治战略重心时期主要表现在 1949 - 1978 年间，努力维护“以一个中国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利益，是这一时期中国处理体育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例如，无论是 1952 年我们匆忙地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还是 1956 年我们放弃参加墨尔本奥运会，以及 1958 年我们退出国际奥委会，都证明了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维护国家的统一与主权，是我们当时处理与国际体育组织关系的基本点，任何挑战这一底线的做法都不被允许。又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家政治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我们甚至提出了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在我们自己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我们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采取的是无偿体育援助。

所谓经济战略重心时期主要表现在 1979 - 2000 年间，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体育对外关系也开始走上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轨道。例如在对外援助体育场馆建设方面，我们在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同时，在政策上略有调整，即改完全义务为部分有偿援助。此外，在服务经济建设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是体育“引进外援”。随着 90 年代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1993 年中国体育界也拉开了深化体育改革的序幕，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的改革目标，

并决定在“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改革发展中，以足球的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在我国足球超级联赛制度和男篮甲 A 联赛（CBA）制度中，出现了大量的运动员“外援”，有力地提升了中国职业体育竞赛市场的影响力。

所谓文化战略重心时期主要表现在 2001—2008 年间，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家“软实力外交”的提出，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也转入到了一个文化战略时期。这首先表现在对武术的国际推广上，如以 1990 年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国际武术联合会为依托，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锦标赛。其次是随着 2004 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以后，借助孔子学院的创建，也加快了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速度。再次是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为舞台，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让全世界穿越时间隧道实现了一次对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浓缩之旅。

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了重点突破与兼顾一般原则。回顾当代中国的体育对外关系，我们发现，无论在战略关系的安排还是在策略关系的选择上，都始终坚持了“重点突破与兼顾一般”的原则。

所谓重点突破，就是在不同时期，重点突破一些影响全局的体育关系。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点突破，是建立社会主义体育联盟关系；60 年代的重点突破，是发展同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体育关系；70 年代的重点突破，是建立中美间的正常体育关系；80 年代的重点突破，是全面进入国际体育组织；90 年代的重点突破，是拥有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21 世纪后，则是通过奥运舞台全面展示体育大国形象。所谓兼顾一般，就是根据不同时期与不同国家或国际体育组织的发展要求，正常处理好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发展关系。

总之，在体育全球化语境下，新中国体育对外关系能注意遵守国际体育惯例和尊重国际体育组织领导，灵活处理国家之间和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努力自我发展和争取国际体育话语权的同时，勇敢承担了推动国际体育不断发展进步的责任和义务，展示了良好的大国体育形象。

三、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社会发展影响

（一）建国初期的“一边倒”体育对外关系战略，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强大联盟，使我们在借鉴苏联发展的基础上，很快打开了新中国体育对外发展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道路，

并为后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看，建国初期的体育对外关系战略不仅奠定了新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基础，而且为后来新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处理，提供了政策基调，提供了思想方法。使新中国体育在对外关系方面不断有所创新，并引领着中国体育的不断发展。终于在2008年的北京胜利召开了无与伦比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

(二)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发展最艰难时期，由于我们既要反苏又要反美，客观上造成了苏美两霸南北夹击中国的不利形势，由此我们的体育对外关系战略只能寻求在第三世界的生存空间，并终于在开拓非洲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而这一影响至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三) 以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为形式，以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为实质的“乒乓外交”，使中美两国跨越了以往的障碍，结束了相互隔绝的时代。它改善了国际关系，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那么，要使21世纪成为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世纪是不可能的。”确实，“乒乓外交”不仅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为后来国际体育关系的正确处理和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四) 体育对外关系中的“奥运模式”，是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战略构想在中国体育界的成功实践，它为体育界寻找一种既坚持原则、又从实际出发，并能为各方都接受的解决国际奥委会“中国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理论依据。“奥运模式”不仅公正、圆满地解决了国际奥委会的中国问题，使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重新得到修复，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也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为中国体育的后来发展开辟了一条星光灿烂的胜利之路，并为世界处理国家和地区间有关体育代表权的争议问题，同样提供了一种可资执行的思路。所以“奥运模式”是开明的政治，是光辉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处理有关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育发展问题的最为成功的伟大实践。

(五) 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更是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史上的经典之作。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更是长久的、持续的、巨大的、健康的。北京奥运让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欣赏到了国际一流的体育比赛；北京奥运也让中国人对体育有了更深的解读：体育不仅是竞技，是挑战极限和超越自我，是勇气和正义，是胜不骄败不馁；体育更是一种体验与习惯，是一种快乐与享受，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北京奥运让每个中国人更加确立起终身体育的意识和行为。

四、当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

当代社会，在经济全球化带动下，文化发展也逐渐表现出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奥林匹克运动影响下，世界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一体化趋势越发凸现。由此，当代中国的体育对外关系发展将有如下的趋向：

（一）作为坚持为国家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服务的历史主线不会改变，在此基点上，将会继续向国际开放中国的国内体育市场，并通过请进来等措施，加快中国体育的社会化、职业化进程，加快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机制的转型和体育市场的培育，以及弱势运动项目的提升和进步。

（二）在走出去发展战略中，除继续鼓励优势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到国外发展，实现“养狼计划”外，更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如今的全球化趋势更多表现出是西方体育文化的进一步扩张趋势，是西方强势体育文化吞噬东方弱势体育文化的趋势，是中国民族体育文化有可能继续被不断边缘化的趋势，由此带来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捍卫我们固有的体育文化传统，并将它很好地推向世界。

（三）巩固和发展我们在世界体育舞台上的话语权，维持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应是今后中国处理体育对外关系的基本目标定位。

总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常常发生在战争、掠夺、经济繁荣或国家的重大变革时期。今日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影响力不断攀升的蓬勃时期。全球化语境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最佳契机。因此，面对国际体育舞台上长期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民族文化被边缘化的基本格局，我们理应以积极的态度、务实的精神和可行的战略去思考和谋划，怎样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努力向世界充分展示中民族体育文化的魅力和科学文化精神，并一步一步地共同繁荣。有的放矢地占据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高地，以重铸中国历史的辉煌，引领世界体育文化的将来发展方向。

我们认为：在未来体育对外关系中，我们应有这样的操守、气魄和决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 (1949—1956)	(1)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关系	(2)
第二节 推动睦邻友好——中国和非社会主义亚洲邻国的体育关系	(23)
第三节 迂回战术——中国与少数西方国家的体育关系	(28)
第四节 为权利而斗争——中国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32)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探索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 (1956—1966)	(50)
第一节 重点突破——中国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体育关系	(51)
第二节 坚持团结——中国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关系	(71)
第三节 争取支持——中国发展与西欧国家的体育关系	(87)
第四节 展示自我——中国发展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93)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严重挫折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 (1966—1976)	(106)
第一节 “乒乓外交”——中美体育关系的突破	(107)
第二节 求同存异——中日体育关系的新发展	(126)
第三节 互通有无——中欧体育关系的进步	(138)

第四节	破解神秘——中非体育关系的新篇章	(146)
第五节	亮相德黑兰——新中国首次参加亚洲运动会	(155)
第四章	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 [一]	
	(1977—1992)	(165)
第一节	奥运模式——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巧妙处理	(166)
第二节	承担责任——中国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之间关系的增进	(193)
第三节	熊猫盼盼——中国与亚洲地区国际体育组织关系发展的 响亮名片	(240)
第四节	全面开花——中国与世界各国体育双边关系的良好建立	(258)
第五章	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体育对外关系 [二]	
	(1993—2008)	(303)
第一节	从北京申奥到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与国际奥委会 的关系	(304)
第二节	从亚洲到全球——中国与其他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	(359)
第三节	从对外援助到引进外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体育 双边关系	(403)
后 记	(439)
参考文献	(440)

第一章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体育 对外关系 (1949—1956)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它使中国社会实现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1]这个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建国头三年(1949年10月—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后四年(1953—1956年)为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

两个阶段相互衔接。前一阶段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了被国民党反动统治和长期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后一阶段,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的建设。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这样,就在我国建立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对外关系上,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本改变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在国际上争得真正独立平等的地位”。^[2]为此,在体育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是服从和服务国家外交的大政方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对外关系的处理原则。

[1]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3.

[2] 窦晖.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述(王洪序)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第一节 同志加兄弟——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关系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外交的大政方针是什么？是“一边倒”。所谓“一边倒”，就是中国决定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正如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规定新中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时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一边倒”方针是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主席在其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

而事实上这应该是毛泽东主席酝酿已久的答案。因为最早在1947年初，中共中央就曾向苏共方面提出过毛泽东主席访苏的要求。1948年4月26日，毛主席又曾亲自拍电报给斯大林，详细地说明了他要尽早地访问苏联的理由，并将行程、要商讨的问题以及随员的名单都告诉了斯大林。^[3]

正是在这样的对外政策要求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国体育对外关系也是实行的“一边倒”方针，即采取了全面学习苏联体育和向苏联体育看齐的做法，从而形成了我们对苏联国家发展体育事业模式的模仿或照搬，

[1] 窦晖.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概述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3.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2.

[3] 孔寒冰. 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66.

并一直影响至今。

一、与苏联国家的体育关系

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与苏联的体育关系,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构架下而建成的一种全面合作的体育关系,一种学习借鉴的体育关系。

(一) 全面合作的体育关系

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于1950年2月,而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意愿,应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形成共识。这不仅表现在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表现在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的访问苏联;也表现在苏联领导人明确的态度上。例如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欢迎刘少奇秘密访苏的宴会上曾这样指出:“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所以,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0月2日,苏联政府即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次日和中国正式建交,同时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从此,中苏两国进入了友好相处的“蜜月”期,双方的体育关系也随之出现了全面合作的基本态势。

1. 实现政府体育代表团互访

1950年8月,应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邀请,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徐英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体育代表团一行12人,从8月28日—11月28日,在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和学习。这是新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体育代表团。他们分别考察了苏联体育的组织领导、干部培训以及组织比赛等问题。包括参观全苏田径运动大

[1]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41.

会，考察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大学和中央体育研究院，以及访问工厂和学校的公共体育宫等内容。对于这次代表团的访苏活动，当时的体育媒体曾有过以下短评：“我国派体育访问团到苏联去，这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体育事业的关怀。我们对这种深厚的兄弟情谊，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赴苏的体育访问团，意味着中苏两国人民以及体育工作者的友谊进一步的增长，是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体育的重要开端。”^{〔1〕}徐英超团长回国后的报告主题就是：“要学习苏联先进的丰富经验，来建设中国的国民体育事业。”^{〔2〕}

新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第二个政府体育代表团是1954年。应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邀请，以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体育代表团，从7月13日到8月17日，再次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对于这次出访，我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前往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就有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邓小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各部门负责人萧向荣、朱早观、傅秋涛、萧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余心清，国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和代表罗瑞卿、沈雁冰、蔡廷锴、伍修权、曾昭抡、胡愈之、范长江、刘墉如、黄中、朋斯克、王纪元等，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罗毅，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子久，全国妇女联合会代表刘加林，中央体院院长钟师统，以及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华司考。

代表团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梯比里斯参观了城市的主要建筑、大学、博物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地、公园和文化宫；访问了苏联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以及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等。特别是1954年的全苏体育节，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贺龙同志所描述的那样：“三万多名运动员参加的几十项集体表演和个人竞赛，紧凑、和谐、有条不紊地向近十万观众展示出一座表现青春和幸福的大花园。在这些表演中，我们看到了苏联体育运动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苏联运动员高度

〔1〕 短评：送赴苏体育访问团〔J〕。新体育，1950（3）。

〔2〕 中国赴苏体育访问团回国抵京〔J〕。新体育，1950（6）。